

“广告中现新闻”： 第一份中文商业报刊的两重性分析

王天根，林娜

(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安徽合肥 230000)

摘要：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值英国对华资本输入与殖民掠夺。这一社会语境下在华中文商业报刊，其讯息内容带有一定的新闻性，呈现商贸属性的货价纸向政治属性的新闻纸转向。笔者以《香港船头货价纸》为中心，分析该报的广告及“新闻”专栏等信息，探究第一份中文商业报刊广告信息的殖民属性，继而分析其“新闻”专栏所发挥的宣传作用，从而探讨英国在华殖民利益对英商在华商业报刊的政治化影响。由此揭示商业报刊对英国在华政治殖民活动的参与。近代中文商业货价纸向新闻纸的历史性转变，是殖民掠夺语境下在华外报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被殖民地商业贸易同殖民活动综合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货价纸；新闻纸；香港船头货价纸；“新闻”专栏

中图分类号：G2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418 (2022) 02-0109-09

近代媒介对于政治活动的参与，涉及报刊运行。中国早期在华外报的创办，同西方在华的殖民活动并行不悖。《香港船头货价纸》被誉为第一份中文商业报刊，所谓“广告中现新闻”，指该报的部分资讯类似新闻或本身即是新闻，体现出中文商业货价纸向新闻纸的历史转向。目前学界有关《香港船头货价纸》的研究，主要基于新加坡学者卓南生对该报的资料挖掘。2002年，卓南生在《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的附录部分，附载了现存79份《香港船头货价纸》，主要论证了该报与《孖刺报》《香港中外新报》及《香港新闻纸》的关联。卓南生（2002）认为“《香港船头货价纸》虽然是华人编者主持，但始终只是《孖刺报》的附属报纸，跳不出外国人办报的范畴和框框。”^[1]王天根（2011）从该报登载的鸦片贸易等经济新闻的角度进行分析，其认为“《香港船头货价纸》作为商业通讯类新闻纸……是英方对华重要的经济类喉舌”^[2]。周燕（2012）从经济传播的角度，分析了《香港船头货价纸》经济新闻的传播策略及内容，并论述了该报在促进香港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3]。苏晨（2019）则更多分析了《香港船头货价纸》所蕴含的中国意识^[4]。相比之下，本文主要基于英国对华资本输入与殖民掠夺的历史语境，论述首份中文商业货价纸所呈现出来的新闻性，分析广告货价纸向新闻纸的历史性转向。

一、货价纸：殖民掠夺背景下的广告信息传播

《香港船头货价纸》作为第一份中文商业报刊，主要登载船期、货价、售卖等商业广告，大多属于客观性的信息内容。客观性的广告内容背后，蕴藏着殖民掠夺性质的商贸活动。作为英商所属刊物，《香港船头货价纸》的广告内容呈现出与英国对外扩张的殖民活动密切相关的特征，有其历史语境。

1841年1月16日，英国义律大佐以公使名义发表照会，称香港为“英国寄居贸易之所”^[5]。香港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不列颠图书馆藏中国近代珍稀文献辑录、校勘并考释”（15ZDB038）；安徽大学学术创新团队“中国新闻舆论史研究”（A类项目）。

作者简介：王天根，男，教授，博士生导师。林娜，女，博士研究生。

由此成为英人在华活动的主要集聚地。政治殖民权益的获取,为商业殖民贸易、外报在华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1850 年以前,《香港钞报》(*Hong Kong Gazette*)、《中国之友》(*The Friend of China*)、《香港记录报》(*Hong Kong Register*)、《德臣报》(*The China Mail*)等多份英文报刊在香港刊行,香港成为外人在华办报刊的集聚地。作为殖民活动的产物,《香港船头货价纸》的刊行主要是为在港商业活动服务的,该报包括报名、期号、出版日期、专栏名、具体的登载内容等,皆为自右往左的编排顺序,适用了斯时华人的阅读习惯,有利于外商在华贸易的拓展。除礼拜天外,该报两日出版一期,一礼拜共有三期,分别在礼拜二、礼拜四及礼拜六刊行,每期共有两版,每版划分为四列,自右向左,第一列第一条内容皆为该报版面招收广告,其次为固定设立的“新闻”专栏,该专栏所占版面大多不会超过一列的三分之二。除“新闻”专栏外的其他版面,多为商业广告讯息。通览该报的广告讯息,可知此些商贸讯息与现代固定性的广告内容大有不同,登载广告不在于宣传商品价值属性,而在于将货物信息本身广而告之于他人,且广告内容多变类型多样,呈现出与商业殖民活动同频共振的时代性特征。

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广州十三行被指定为对外贸易的唯一港口,中外贸易多集中于此地。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广州十三行的部分商人,为了牟取暴利,开始贩卖鸦片,其后林则徐虎门销烟。香港距离广州地理位置较近,英国的对外殖民扩张行至于此。1842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清廷战败,中英签订《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给英国,英国自此将其作为英商在华重要贸易港口。斯时,在港商业报刊更多发挥的是提供商贸讯息的传播作用。《香港船头货价纸》的商业广告,主要包括洋船出售、吕宋烟出售、药材出售、洋硝出售、商贸路线、火轮船出行、鸦片行情等内容。这些商业广告变动频繁、出售货品多样,与斯时香港商业殖民活动密切相关。吕宋烟出售、洋硝出售、鸦片行情等属于英商掠夺财富的主要商贸行业。斯时清廷正在实施禁烟,如此大规模地登载烟土广告,可见该报对于鸦片贸易的关注与苟同。

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商贸往来,《香港船头货价纸》每期设有固定版块“现在香港澳门黄埔落货往各埠之船”,如第 198 号所载罗活、仔地厘、占时邦郎、马启打、山打过罗时、北力便连时、后打、歌律、押么时非臣、云地滑士等,皆为商船番号,用以公示香港、澳门、黄埔等地货船的出行信息,其所登录的货船多为西方列强所有。此版块内容分有“船名”“船主名”“庄口名”及备注等四列,“船名”“船主名”“庄口名”等字幕横向排版,具体的船名、船主名、庄口名则竖向排版,上下一一对应,第四列无标题,用以标明船只扬帆的具体时间。在具体的“船名”排序中,该报以船只到达的目的地为分栏,将前往同一目的地的船只归纳一处,可见该报编辑人员的版面编排意识。船只目的地相对稳定,彰显了香港商贸活动的地域范围,主要包括乌约菲、旧金山、雪梨钵非立、上海、小吕宋、葛刺巴埠、厦门福州、孟加刺、英国、日本等地,可见来港商贸航行范围之广,主要涉及中国、美国、非洲、日本等,其中上海、厦门、福州等地,皆因第一次鸦片战争清廷战败而被开放为通商口岸,英人在此些地区获得了居住权及设派领事的权益,英商在此进行商贸活动成为可能。

除固定版面登载多条船期外,《香港船头货价纸》亦有固定的“前往旧金山”“前往上海”“前往新金山”“前往城省”等专栏,用以单独登载前往特定目的地的船期信息,具体介绍船名、船主名、搭载货品及来港离港时间等详情内容。如该报在己未年正月初一日(1859 年 2 月 3 日)刊发的第 197 号“前往旧金山”专栏,即登载了商船公司于 1858 年发出的搭客搭货广告,有两条船期信息,第一条船讯:“未士,士店臣公司有第一等好驶花旗船一支,名山打过罗时,船主名科时打,可载货一千二百墩(吨),准于早日扬帆前往旧金山正埠,如欲搭客、搭货者,请到本行面议。戊午年十一月初一日启”^[6],该广告的具体发出时间为 1858 年 12 月 23 日,具体介绍了士店臣公司有船名为山打过罗时,船主名为科时打,该船可载货一千二百吨,将由香港行使至美国。第二条船讯:“未士,吸文士急波时文公司,有第一等好驶花旗船一支,名歌律,船主名波蓝,一千八百墩(吨),准于早日扬帆前往旧金

山, 现在船位已有人定下大半, 如有搭客、搭货请到本行面议。戊午十二月廿九日启”^[6], 该广告发出时间为 1859 年 1 月 31 日, 具体指明吸文士急波时文公司, 有名为歌律的船只, 该船已有大半船位被预订。此两条商船搭客、搭货广告发出时间相差近两个月, 然《香港船头货价纸》的发布时间皆在 1859 年 2 月 3 日, 可见该报对前往同一目的地商船信息的集中性登载, 利于潜在客户的信息获取。由此可见, 该报作为信息类广告纸所发挥的信息传播作用。

除船期、货价、行情等商业信息外,《香港船头货价纸》设有固定的“新闻”专栏,用以登载军事、政治、经济等信息,由此凸显该报作为新闻纸存在的宣传功能。

二、新闻纸：《香港船头货价纸》的宣传功能

现存《香港船头货价纸》刊载的时间,集中于 1859 年 2 月 3 日至 8 月 27 日,时值第二次鸦片战争。《香港船头货价纸》的“新闻”专栏,涉及中英商贸、中美商贸以及中法商贸等;英军在华军事行动、法国西班牙联合攻占越南、英法联军攻占大沽、太平军农民起义及中国内地局部军事冲突等政治军事行动;传教士在华布道、外人来华游历等外人在华动态;香港、天津、澳门、上海、厦门、广州等沿海港口贸易;澳门抢劫、洋海盗、海上凶杀和涉华“猪仔”等局部社会新闻。《香港船头货价纸》的“新闻”专栏及其形态演化,充分显示了货价纸向新闻纸演变的历史转向。

经查阅可知,现存 79 份《香港船头货价纸》设有固定的“新闻”专栏^①,登载新闻一条或多条。据不完全统计,该报“新闻”专栏除“京报”、“宁波新闻”及征稿广告等信息外总数约 274 条^②,以内容属性分类,可将其分为政治、经济、社会 and 军事四大部分,其结果如图 1 所示。可见,军事新闻及政治新闻分别约占新闻条目总量的 30% 和 18%、经济新闻占比 28%、社会新闻占比 24%。政治军事新闻主要涉及英法联军攻打大沽口、法国西班牙攻打越南、太平军起义等军事调动,此与中国内忧外患的处境密切相关,内有洪秀全、杨秀清等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外有英、法、美等国在天津大沽口发动的侵华战争,同时法国西班牙两国亦发兵攻打清廷附属国越南。值此复杂社会语境《香港船头货价纸》彰显中文商业报刊宣传的新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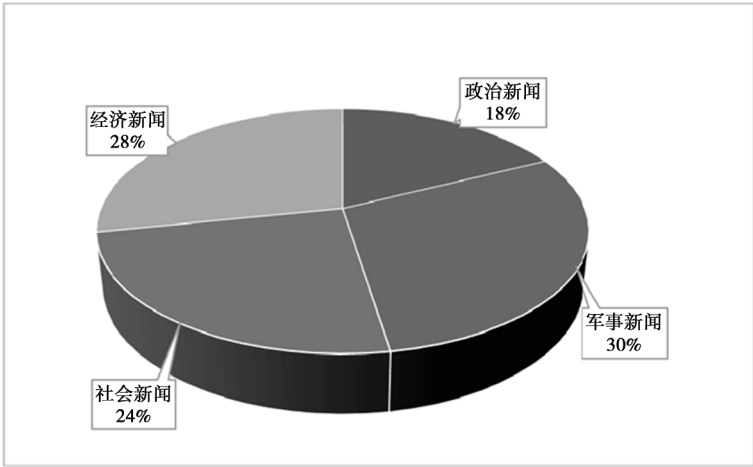


图 1 各类新闻在“新闻”专栏篇目总数中所占比重

① 其中第 226、268、269、274、275、276、278、280、282、283 等号共计 10 期缺少,且第 246 期无“新闻”专栏,原新闻版面被上谕取代。

② 卓南生先生在其论文中写到“新闻”专栏的新闻总条目为 277 条。

（一）新闻纸的国家意识：《香港船头货价纸》对政治殖民利益的诉求

现存 79 份《香港船头货价纸》刊行时间均为 1859 年，时值第二次鸦片战争，该报极为关注。

1. 密切关注英军在华军事调度

1858 年《香港船头货价纸》大量登载了英法联军在华军事行动的信息，具体分类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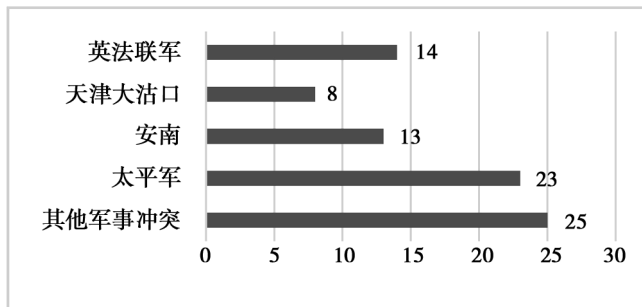


图 2 各类新闻在军事新闻中所占比重

其时，大沽口为进入天津的门户，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英法联军行至于此，多与英法两国攻打大沽口的军队调动有关，总计 22 篇，占军事新闻总数目的 27.2%。该报自 1859 年 3 月 15 日出版的第 214 号，登载“新闻”：“粤海关租得火轮船二支，一名金花，一名士瓜利厘，前往江门陈村各处海面缉私，用心加增国课，使早日结清赔补英法之项，照和约之专条，要此项清楚，然后交回粤城与大清管辖。但闻于本年五六月间来，任大英钦差大臣上北京驻劄，若见大清皇帝并群臣民庶。各人保守《天津和约》，虽赔补之项，尚未清结，英法兵勇亦将退守羊城”^[7]，宣告 1859 年五六月份英国官员将到北京驻劄。至 1859 年 8 月 18 日第 281 号，该报登载“法兰西提督除留在安南守度郎细江埠，尽将法国船只兵勇调回中国，北上会同英师。未知即往攻大沽，抑或在镇海调养，候该国上谕到，然后行事”^[8]，前后近半年，《香港船头货价纸》多次报道英、法、美等国前往北京商谈合约及第二次大沽口战役，可见该报对英国在华军事行动的密切关注。

1859 年，《香港船头货价纸》有关英法等国与清廷换约一事的登载，即表现出维护英国利益、传播英方“英明”形象的特征，由此凸显其作为新闻纸存在的宣传作用。有关“进京换约”一事，额尔金在日记中有载：“谈判决定的是《天津条约》将在一年生效，也就是 1859 年 6 月 29 日。普鲁斯先生^①的任务就是在日期临近时前去北京交换批准文书”^[9]，可见英方驻华公使普鲁斯计划前往北京交换批准文书。1859 年 3 月 17 日，《香港船头货价纸》第 215 号首次登载换约之事：“咸丰君实不欲英国钦差大臣进京，故此迁去两广总督之洋务钦差关防，交两江总督管理。又留桂中堂^②、花大人^③二位钦差在江南，俟候来任，大英钦差到上海，或以言语阻他进京之意”，并附有评语“以上之言，未知真否。如若是真，可见大清官长屡屡办事，如同小子弄戏一般。虽立明和约，两国钦差盖了关防，以昭信守，亦有悔恨之意也”^[10]，该报新闻报道涉及换约之地在京城，此些新闻不再是单纯的信息登载，已发展成为带有价值偏向的时评，可见近代中文商业报刊不仅具有广告信息传播功能，且已表现出明显的政论色彩。

据《东华续录》载，清咸丰八年（1858），清咸丰帝表示“桂良等既拟在上海互换条约”^[11]，可见咸丰帝认为换约之地在上海。值英法等国欲进京换约时，咸丰帝表示“若不能阻其进京，以致夷船复至天津，则无论动兵与否，朕惟桂良等是问”^{[11](240)}，可见，斯时清政府的外交策略与军事行动，均不欲英法联军进京。1859 年 5 月 31 日，《香港船头货价纸》第 247 号登载新闻：“现在英、法、花旗钦

① 普鲁斯，即英国新驻华公使。

② 桂中堂，即大学士桂良。

③ 花大人，即吏部尚书花沙纳。

差,各带来本国御笔批准之和约,议于六月进京交付,但闻桂中堂、花大人请各外国钦差不可进京,称说此事不合中国规矩,又用言辞阻止……惟英国钦差、提督各奉英国上谕进京朝见,咸丰君亲手交付御笔批准之和约,令在必行,是以英国钦差多带战船兵勇前往天津,以防不虞及阻止等事”^[12],并指出“去年五月间,英、法、花旗三国钦差往天津,先见直隶总督谭大人^①,但伊未有钦差大臣便宜行事之关防,故英法钦差不与之商议两国大事。后咸丰君特派桂中堂、花大人为钦差到天津,故英法钦差与之商议,将所议和约五十六款抄录二本……以一年为期,彼此各派大臣于大清京师会晤,互相交付”^[12],该报通过论述换约交涉详情,指出英国钦差之所以带战船兵力前往天津,是为了防止换约出现预料之外的事,以此阐释英法联军前往天津的目的。咸丰帝对桂良上奏英、法、美等国“进京互换和约”之事,批奏曰“览奏实深诧异,各夷和约本议定在上海互换,是以授何桂清为钦差大臣,原冀桂良等即在上海妥为办理,乃迟之,又久于进京等事尚未挽回,西英额尔金驶回香港,另换伊弟普鲁斯到沪,并欲直至天津,是该夷意存叵测,已可概见伪。该酋仍到上海,桂良等务须极力开导,告以大皇帝派我来此办理税则,并令广东将钦差大臣关防移交何桂清所有,和约并另立专条,必须即在上海,由我等一手办理。若到天津,该处并无经手之人,无从办理”^{[11](264-265)}。可见,清廷记录换约之地在上海,为此特授两江总督何桂清为钦差大臣,以处理换约事宜,然英、法、美等国并未照议定换约之地,前往上海与桂良进行互换条约,且《香港船头货价纸》涉及换约之事,主要以英方利益为主,重点论述英法联军前往天津的目的在于防止换约出现意外,尤其可见该报亦赞同换约之地在北京的说法,同英方代表普鲁斯一致,可见该报对英官员记录信息的认同。随后,《香港船头货价纸》连续登载了“大英往天津之大战船七号根砵,九号载陆兵船,两号共成一十八号”^[13]“英人立意进京,故大英钦差多带兵勇于五月十五日由上海启行,向天津前进。如僧王^②敢用兵阻止,英人断不肯罢手”^[14]“英、法、花旗三国钦差往北已经十日”^[15],至“英法各勇于五月廿五日在北河口大沽炮台交仗(战)”^[16]等,多条有关英法联军攻打天津大沽口的新闻,该报详细登载“大英”在天津的军事行动,指出如果僧格林沁敢用兵阻止,英国断不肯罢手之意,以此表明英国进军天津的决意,新闻纸的宣传价值明显,彰显了该报向政治殖民活动宣传工具角色的转变,作为信息传播的货价纸,转变成带有价值宣传的新闻纸。英法联军作为斯时对华殖民扩张的主力军,两国在华军事行动活跃,在华利益谋取不断增加,然英法两国的国家利益,并不能够始终保持一致,在英法利益冲突时,《香港船头货价纸》断然为英国进行辩护,彰显了该报作为英属报刊的国家认同意识。

2. 涉英利益的偏向性内容刊载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法国除同英国联合作战,亦与西班牙联合攻打清廷附属国越南。其时,正值美国旧金山“淘金热”,大量华工被运往旧金山进行淘金,热衷于对外贸易扩张的英国、法国、西班牙等国亦积极地进行资金储备。1859年2月26日,《香港船头货价纸》第207号登载了法国、西班牙联合攻打越南的起因,“天主教巴礼在安南东京,地方相连中国广西、云南两省,寻得有出金、出银山矿,是以西班牙^③、大吕宋^④人与法兰西人借天主教巴礼在安南被地方官所杀(杀)之事,即两国合兵攻击安南国云”^[17],该报报道越南发现有金银矿山,由此法国、西班牙联合攻打越南,而“天主教巴礼在安南被地方官所杀(杀)”,仅是法国、西班牙为占领出金出银山矿的借口,可见《香港船头货价纸》没有为法国、西班牙等在越南谋取殖民利益作辩护。其后,《香港船头货价纸》对法国、西班牙联合攻打越南的军事行动,进行了多次报道,总计13条。同年3月10日,《香港船头货价纸》第212号登载新闻“现在泰西诸国,你恶我权,我妒你势”^[18],表明其时欧洲列强存有殖民利益冲突,并连续

① 谭大人,即谭廷襄。

② 僧王,即僧格林沁。

③ 西班牙,即西班牙。

④ 大吕宋,即菲律宾的吕宋岛。

报道“法国常妒英国得志于西竺，尽获鸦片餉务，每年不下 200 万元，故上年法国闻在广东省城因亚罗华庭之事，法国即发兵助英国者，非因英国兵少，故出兵相助之。实恐英国独获其益而已”^[18]，此为《香港船头货价纸》就“亚罗号事件”中“法兰西国助英国合兵攻击中华，有一弓开两箭之意”作辩解之报道，该报同时指出法国之所以出兵帮助英国，并不是因为当时英国兵力少，仅是因为法国担心英国独占殖民利益，其出兵“实法人欲得安南土地而已”^[18]，在报道英法联军攻打清政府时，《香港船头货价纸》首先强调了法国出兵帮助英国，并不是因为英国兵力少，其次，该报指出法国愿出兵的原因仅是“欲得安南土地”，可见国与国之间共同的殖民利益，仅可作为国家合作的基础，其根本利益并不一致，合作在于谋取两者在华的共同殖民利益，然《香港船头货价纸》在报道英法联军攻打中国时，仍旧阐明了法国之所以助英国，其根本原因是害怕英国独占殖民利益，该报同时指出法国船只之所以能够到达越南，其原因即在于“亚罗号事件”中，法国帮助了英国，以致英国“允许法人出大军东来”，否则“若英人不允，法船则不能来”，《香港船头货价纸》借此彰显英国在法国能够东来中的强势之姿，体现出该报宣扬英国之强大的国家意识。

1859 年 3 月 29 日，《香港船头货价纸》第 220 号登载新闻：“兹接到安南信札云：于旧岁十二月三十日，法兰西、西班牙两国战船共八号，另陆兵一千名，由安南度郎港口，扬帆南驶，于本年正月初十日到安南细江城河口。法兰西与西班牙战舰即与河口各炮台攻击，毁坏炮台数座。于正月十四日，水陆并攻细江城，攻了个半时辰，其城即破，兵丁搭云梯入城，逢人便杀，安南兵勇逃走者不计其数，在此城法兰西人所获钱粮甚多，云云。”^[19]较为详细地报道法国、西班牙兵丁在越南的残暴行为，未见该报为两国的殖民掠夺行为掩盖的意思，可见该报对于他国意识的区分。

其后，至 1859 年 7 月 16 日，《香港船头货价纸》未再有法国、西班牙在越南暴行的报道。7 月 16 日，《香港船头货价纸》267 号报道指出“法兰西与安南交战（战）之事谅必和妥”^[20]，期间，《香港船头货价纸》虽仍有多篇有关法国、西班牙合力攻打越南的报道，但鲜有批评之语，此种转变可能与英、法、美等国即将与清廷换约有关，因《香港船头货价纸》5 月 19 日出版的第 242 号即登载了清政府派钦差“于本月初旬返上海，与英国钦差酌议更改前所立之和约”^[21]，此后，英法联军借换约之名发动了第二次大沽口战役，两国利益趋于一致，由此可见《香港船头货价纸》在利益立场上，始终保持与英国一致，是为英国国家意识在报刊内容报道上的体现。

（二）新闻纸的社会效应：《香港船头货价纸》有关中英“友好”往来的镜像

第二次鸦片战争前，香港及其他沿海地区，人口贩卖、海盗等非法活动猖獗，“无赖之徒往各处拐骗无知无识之人”，其背后亦有非常暴力的非法殖民利益诉求，“现在澳门每得猪仔一名，当人肯出银三十大员，赏与引带之人”^[22]。中国地方居民被当作“猪仔”被运往其他国家充当劳动力，导致大量人口失踪。1859 年 4 月 16 日，《香港船头货价纸》第 228 号，登载落款为“粤东良民同启”的文章，大力谴责猪仔贸易，并发问“何竟荼毒良民若是，其惨大抵凶残戎狄豺狼成性，其设计之毒则烈于虎噬，其害人之惨则倍于鲸吞。凡属洞悉情弊者，金恨食其肉而寝其皮，取彼凶人祭獭而葬诸鱼腹，悬梟而大振雄城，然后众怒乃得其平。”^[23]面对民众异常仇视非法人口贩卖，《香港船头货价纸》谴责殖民入侵而致猪仔贸易行为的残暴，将其比作凶残的豺狼，并指出猪仔贸易之毒害，比虎噬更惨烈，比鲸吞更可怕，如此严厉之语谴责贩卖华人的猪仔贸易，利于读者对其好感度的提升。然《香港船头货价纸》报道猪仔贸易，其“与当时英国殖民当局‘反对猪仔贸易’，但却提倡‘华工出洋合法化’的政策相吻合”^[24]，可见《香港货价纸》报道猪仔贸易，亦是该报同英国殖民当局相关政策同行的体现。除涉及非法人口贩卖的新闻外，《香港船头货价纸》亦登载了英国商人、官员在华种种友好行为，同时使用连续报道的形式登载在港英国官员审查华人的案件，以示“英君主一视同仁”^[25]之镜像。

自《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各国得以在华各地自由进出。《香港船头货价纸》第 203 号“新闻”专栏：“英法提督带领兵勇于正月初六起程往花县地方游玩……由省城至花县一路人民皆以礼相待。到

花县时, 县令并绅仕耆老出城迎接英法官员入城住……”^[26], 英法联军在中国地方游历, 已然不受地方人员的反对, 皆“以礼相待”, 虽不知民众的真实心理, 但从《香港船头货价纸》的报道, 可看出民众及地方官员绅士, 表面上欢迎英法联军到中国地方游历。除英国官员在华行为的友好宣传外, 《香港船头货价纸》亦借相关唐人被害之案件宣扬英国统治之“公正”。

受战乱及殖民掠夺的影响, 19世纪中叶的沿海地区海盗猖獗, 抢劫、盗窃、杀人等事件时有发生。1859年2月22日“孖舌地时船三名番人水手谋死唐人事仔”一案在香港经大葛受审, 2月26日至3月5日《香港船头货价》共出刊4期, 其中有3期连续登载了此案件, 并配有评语“由此可见, 大英君主一视同人, 无论唐、番命案亦照律办理”^[25], 借以宣传英人在华殖民地香港岛治理的“公平公正”, 其后3月5日出版的210号及时登载了此次案件受理的结果: “大宪批准于二月初三日朝早, 将两名凶手问吊, 又一名凶手永远监禁”^[27]。自“本月廿二日大葛审讯得其确据”^[17]至审判结果的实施报道, 前后约计十日, 连续并完整地呈现, 英人在港治理能力之强与执行效率之高。其后, 《香港船头货价纸》多次报道英军在华各地进行清除贼寇之行迹, 如1859年3月19日登载“二月初七日, 有大英火轮载战船一支, 根砵两支, 驶往高兰等处捉贼。于十二日回港, 报利贼二百余名, 毁烧贼船共三十一支, 毁烧贼船大炮一百五十余门”^[28]、3月22日登载“大英官府极欲海面太平, 除去各种海洋强盗, 现在各号根砵整备听用, 如一闻何处有海洋强盗即往追拿”^[29]等, 《香港船头货价纸》大量登载了英政府对待华人“公正公平”之信息, 以建构和宣传在港英方的良好形象, 是报刊为英国国家利益服务的表象, 亦表现出该报商业经济性质背后所牵扯的政治利益诉求, 《香港船头货价纸》宣传功能凸显。除部分信息传播有宣传之处外, 第一份中文商业报刊《香港船头货价纸》的另外一部分资讯属新闻或曰带有新闻性。就中国新闻史纵向发展而言, 《香港船头货价纸》以货价纸的身份登载部分新闻方面的资讯, 并设有固定的“新闻”专栏, 用以收录专题性质新闻讯息。总体看来, 攫取殖民利益语境下的外商在华办报, 同列强在华殖民贸易密切相关。《香港船头货价纸》为外商在华贸易服务, 其登载“新闻”专栏版面时常全文收录“上谕”、“京报”等官方新闻, 某种程度上继承了中国古代报刊特点, 类似的历史情景还有一些, 诸如1832年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在华创办的《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 作为中国境内第一份来华传教士所办英文期刊, 该报大量登载清廷上谕、官僚奏折等, 这些新闻呈现的要素同现代“5W”模式的新闻并不完全一致。简言之, 《香港船头货价纸》取材中国传统新闻纸的登录内容, 并结合西方新闻报道特点, 一定程度上凸显出该报讯息内容的新闻性。这也是中国新闻发展史中“广告中现新闻”的一个重要历史呈现与展示。

三、货价纸与新闻纸: 中文商业报刊的角色扮演及定位

《香港船头货价纸》兼具货价纸与新闻纸的双重属性。作为第一份中文商业报刊, 《香港船头货价纸》每期共有两版, 每版分为四列, 固定的“新闻”专栏不超过一列的三分之二版面, 该报以非“新闻”专栏的其他版面, 大量登载货品出售、物价行情等类型多样、变动频繁的商贸广告, 为来港商贸往来提供了及时性的商贸信息。除此, 《香港船头货价纸》以固定的“现在香港澳门黄埔落货往各埠之船”专栏, 向读者介绍船期、货运信息, 有效沟通了香港、澳门、黄埔等地的对外商贸往来, 发挥了货价纸重要的信息传送作用。该报以香港周边的商铺职员为主要销售对象, 为其提供及时性的货物出售及船期行程等商业信息, 畸形促进了西方列强在华商贸事业的发展。除登载大量商贸信息, 《香港船头货价纸》设有固定的“新闻”专栏, 用以登载在港英军动态、中外贸易、中外交往等非商业信息, 中文商业货价纸, 开始出现政论色彩浓厚的新闻内容。

殖民掠夺语境下, 作为商业货价纸存在的《香港船头货价纸》, 设有固定的“新闻”专栏, 集中登载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英法联军在华行动等社会变动信息, 彰显出明显的新闻纸属性, 体现出广泛传播商贸信息的“货价纸”向呈现变动信息的“新闻纸”聚焦的历史性发展。该报的“新闻”专栏大量

刊载了英、法、美等国在华政治活动，宣传其在殖民地香港的诸多“友好”事迹，以实现外来殖民者在华人心目中形象的再构建，达到读者思想层面有关英人友好形象建构的效果，体现出强烈的西方殖民国家的政治意识，此是中文商业报刊《香港船头货价纸》宣传功能的彰显，中文商业报刊的刊载内容开始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

总之，近代全球贸易的背景及西方殖民掠夺的语境下，《香港船头货价纸》以大量的版面登载船期、货价等广告信息，为商贸活动提供必要的信息交流，体现出西方列强商品贸易的趋向性。同时，该报以固定的“新闻”专栏，登载新闻内容，用以维护英方国家利益，建构英方在港“公平公正”的形象。广告中现“新闻”，读者不仅将阅读目光投射于广告信息，同时会阅读广告纸中的新闻内容，由此实现报纸所属国的价值输送。殖民掠夺为殖民贸易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制度保障，而为商贸活动服务的中文商业报刊，往往亦为殖民活动充当舆论宣传工具。英国在华殖民政治利益的掠夺，畸形促进在华商业外报的政治化发展。由此，中文商业报刊不仅承担着商贸广告讯息传播的货价纸角色，同时体现报刊所属国的政治殖民利益。殖民掠夺语境下中文商业报刊兼具货价纸与新闻纸的双重属性，且随着外贸拓展，货价纸的宣传功能日益彰显。由此，近代中文商业“货价纸”开始向“新闻纸”转变，此种转向对近代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最终奠定了商业报刊的新闻纸属性。

《香港船头货价纸》向“新闻纸”转变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政论宣传功能，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代中国商业性的货价纸向带有时评、政论的新闻纸的发展。近代中国商业货价纸向新闻纸的转向，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其中则涉及《香港中外新报》的刊行。《香港中外新报》作为《香港船头货价纸》的续刊^{[1](106)}，其工作人员主要是华人。该报刊行之初，由伍廷芳主持，黄胜参与编辑工作，由此积累了一定的办报经验。1873年，王韬与黄胜合资筹建了中华印务总局，而后创办中国第一份政论报刊《循环日报》，开启了早期国人自办报刊的发展历程。可见，斯时在华外报中文版的刊行，有利于培养国人的办报经验，《香港船头货价纸》的“新闻”专栏所体现出来的报刊政论功能，亦对斯时国人创办政论报刊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作为第一份中文商业报刊，《香港船头货价纸》所彰显的“货价纸”向“新闻纸”的历史性转向，有效促进了近代中国商业新闻纸的发展。

作为商业货价纸，《香港船头货价纸》本身即具有一定的信息宣传功能，无论是其登载的广告，亦或是商业咨询，两者存有关联，如“鸦片行情”“烟土出售讯息”等，皆属于以广告的形式登载商业讯息。这些商业讯息同时具有一定的新闻性质，即资讯内容与时俱进的变动性，诸如缘于货品价格不断变动，该报有关公烟土、白茶、米等商品的出售信息，亦出现频繁变动。由此可见，《香港船头货价纸》的“广告”与“新闻”之间，存有一定的融通性，而非非此即彼的关系。于世界新闻史而言，大多数的报纸具备由商业广告资讯传播转向新闻传播的规律。就中国早期报刊发展而言，此种整体性转向出现于1840年《南京条约》签订后。即：随着列强在华殖民利益的拓展，中国的对外贸易的商业主权也随之逐步丧失，在华中文商业货价纸亦呈现全面提供外商贸易所需的广告咨询的“货价纸”逐步转为新闻纸的趋向。简言之，对华中文商业货价纸的重要新闻取向的转向，有西方列强在华殖民掠夺的发展语境，此有别于西方商贸报刊向新闻报纸的转变。另一方面，对华中文商业报刊部分汲取了中国传统报纸邸报、京报的版面编排形式，“新闻”专栏部分或完全地采取了中国官报的信息呈现方式，诸如多采用竖版文字排版、自右向左版面编排，内容上更是继承中国古代报刊一些特点。由此而论，《香港船头货价纸》的新闻属性凸显西方对华报刊在中国本土化发展过程中融通的一些特点，其后如外人在华所办商业报刊《申报》，亦“逐日镌发京报”^[30]。此亦可见，外商对华商业报刊对中国古代报刊属性的借鉴与发展。

讨论《香港船头货价纸》重要转向，应置于中国新闻史纵向发展的历史脉络中。1815年，伦敦布道会米怜在马六甲创办近代第一份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Chinese Monthly Magazine），以传播宗教教义及新知识为宗旨；1828年，传教士麦都思在马六甲创办中文月刊《天下新闻》（World News），

刊载中外新闻、科学、宗教、历史等信息。这些刊物的创办, 主要用于沟通中外, 传播宗教教义的文化碰撞。1857 年, 第一份中文商业报刊《香港船头货价纸》创办于香港, 设有固定的“新闻”专栏, 中文商业货价纸开始带有“新闻纸”的属性, 用以呈现西方列强在华殖民战争及英方“公平公正”的形象。至此, 在华外报完成了自传播宗教教义的文化刊物, 向带有新闻纸属性的货价纸的转变。至 1872 年, 英商美查兄弟公司 (Major Brothers & Co) 在上海创办《申报》, 该报认为“新闻纸之制创, 自西人传于中土, 向见香港唐字新闻体例甚善, 今仿其意设申报于上洋”^[31], 可见斯时中文商业报刊, 已然完成了由“货价纸”向“新闻纸”的转变, 报刊创办者已将商业报刊定义为“新闻纸”。而后, 广告信息多作为商业报刊的收入来源之一存在, 商业报刊更多凸显的是“新闻纸”的属性。总体而言, 《香港船头货价纸》所凸显的中文商业“货价纸”向“新闻纸”的历史性转向, 有效连接了传播宗教教义的文化刊物与重在新闻宣传的商业报刊, 在中国商业新闻纸的发展历程中占有重要位置。

参考文献:

[1] [新加坡] 卓南生. 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 1815-1874 增订版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147.

[2] 王天根. 近代经济新闻价值取向及其政治语境解读——以第一份商业性中文报纸《香港船头货价纸》为中心 [J]. 史学月刊, 2011 (8): 40-48, 65.

[3] 周燕. 香港早期报刊经济新闻传播研究 [D]. 西安: 西北大学, 2012.

[4] 苏晨. 有限认同与曲折表达:《香港船头货价纸》的中国意识研究 [D].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19.

[5] 中国史学会. 鸦片战争 (五)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496.

[6] 新闻 [N]. 香港船头货价纸第 197 号. 己未年正月初一, 1859-2-3 (1).

[7] 新闻 [N]. 香港船头货价纸第 214 号. 己未年二月十一, 1859-3-15 (1).

[8] 新闻 [N]. 香港船头货价纸第 281 号. 己未年七月二十日, 1859-8-18 (1).

[9] [英] 额尔金, 沃尔龙德. 额尔金书信和日记选 [M]. 汪洪章, 陈以侃, 译. 上海: 上海百家出版社, 2011: 166.

[10] 新闻 [N]. 香港船头货价纸第 215 号. 己未年二月十三日, 1859-3-17 (1).

[11] [清] 王先谦. 东华续录 2 [M]. 文澜书局, 光绪 24 年: 240.

[12] 新闻 [N]. 香港船头货价纸第 247 号. 己未年四月廿九日, 1859-5-31 (1).

[13] 新闻 [N]. 香港船头货价纸第 256 号. 己未年五月廿一日, 1859-6-21 (1).

[14] 新闻 [N]. 香港船头货价纸第 257 号. 己未年五月廿三日, 1859-6-23 (1).

[15] 新闻 [N]. 香港船头货价纸第 262 号. 己未年六月初六日, 1859-7-5 (1).

[16] 新闻 [N]. 香港船头货价纸第 270 号. 己未年六月廿四日, 1859-7-23 (1).

[17] 新闻 [N]. 香港船头货价纸第 207 号. 己未年正月廿四日, 1859-2-26 (1).

[18] 新闻 [N]. 香港船头货价纸第 212 号. 己未年二月初六日, 1859-3-10 (1).

[19] 新闻 [N]. 香港船头货价纸第 220 号. 己未年二月廿五日, 1859-3-29 (1).

[20] 新闻 [N]. 香港船头货价纸第 267 号. 己未年六月十七日, 1859-7-16 (1).

[21] 新闻 [N]. 香港船头货价纸第 242 号. 己未年四月十七日, 1859-5-19 (1).

[22] 新闻 [N]. 香港船头货价纸第 206 号. 己未年正月廿二日, 1859-2-24 (1).

[23] 新闻 [N]. 香港船头货价纸第 228 号. 己未年三月十四日, 1859-4-16 (1).

[24] 卓南生, 毛章清. 从“猪仔问题”报刊看《香港船头货价纸》的编辑方针与定位 [J]. 南洋问题研究, 2007 (2): 57-66.

[25] 新闻 [N]. 香港船头货价纸第 209 号. 己未年正月廿九日, 1859-3-3 (1).

[26] 新闻 [N]. 香港船头货价纸第 203 号. 己未年正月十五日, 1859-2-17 (1).

[27] 新闻 [N]. 香港船头货价纸第 210 号. 己未年二月初一日, 1859-3-5 (1).

[28] 新闻 [N]. 香港船头货价纸第 216 号. 己未年二月十五日, 1859-3-19 (1).

[29] 新闻 [N]. 香港船头货价纸第 217 号. 己未年二月十八日, 1859-3-22 (1).

[30] 本馆补印京报 [N]. 申报第 555 号. 1874-2-14 (1).

[31] 本官告白 [N]. 申报创刊号. 1972-4-30 (1).